

第一講

文化與文明

在納丹訪問學者計劃的支持下，我得以進一步思考新加坡作為一個新國家的問題，並在此與大家分享。之前的訪問學者中也有我的朋友，他們對公共政策和治理有深入的了解。我沒有這樣的知識，只能妄稱是獲此殊榮的最年長者。當納丹先生和我還同是學生、住在杜尼安路 (Dunearn Road) 的宿舍時，我曾仰觀作為殖民地的新加坡。¹後來，國家實行自治時，我們都曾短暫地為國效力。也是在那時，我研究了新加坡作為馬來西亞聯邦第十二州的地位。在新加坡加入聯邦的短暫期間，我還曾任職於一個委員會，負責考察新加坡州對國家高等教育的貢獻。

自新加坡脫離聯邦，直到1996年我到此工作，我與新加坡的關聯一直斷斷續續。這是一場錯綜複雜的經歷，我遠遠地從外觀察著關於共和國的一切。新聞不斷報導，這個小國位處兩大洋之間的一個最新定義地區中的核心。這裡的國民大多源自選擇在此落地生根的外來移民。儘管如此，國家領導決意通過融合各族群獨特的文化元素，建構一種民族身份認同。

這座國際都市決心擺脫其文化沙漠的污名，致力於成為現代文明的一員，同時大部分國民也希望保留其祖輩的文化遺產。許多人明白他們的遺產來自古代文明，而最重要的三大文明——印度、中華和伊斯蘭文明，都在生生不息地尋求現代化之路。新加坡與鄰國一起，也在剛剛劃定的邊界內重塑各自的民族文化。

這點尤其引人入勝，我很好奇對於新加坡而言，這到底意味著什麼。數十年來，我一直對馬來亞的新加坡懷有浪漫的想像，把它描繪成一幅充滿本土生機的絢麗畫卷，同時也是一塊交織著世界歷史不同脈絡的厚重氈毯。有時，我不得不暫停想像多元文化的美好前景，例如，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發生暴亂後，形勢看來岌岌可危。我也經歷過瑪麗亞·赫托(Maria Hertogh)暴動，對種族和宗教矛盾有切身的體會。此外，在1964年的新加坡種族騷亂後，我也曾在調查委員會中短暫任職。在如此易燃易爆的種種要素之中，如何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作為一名歷史系學生，我在研究中國歷史的同時，也對海外華人深感興趣。他們是南洋的華僑，所謂「南洋」，就是東南亞地區的早期名稱。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除了種族和宗教之外，還有中國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帝國資本主義和反殖民社會主義相互交織的政治問題。

隨著我深入學習歷史，接觸到更多的古代和現代文明，我對政治也愈發敏感。不久之後，我看到了地方文化與外部影響之間的聯繫，正是這些外部影響塑造並加強了地方文

化。更重要的是，這些影響往往根深蒂固，其深入程度取決於各民族最初到達的時間，以及鄰近文明的活力和實力。

文獻記錄和文物顯示，本地區的大陸和海洋民族並沒有創造出自己的文明。相反，他們接觸到了眾多傳承至今的古老文明，並從中吸取各自所需的要素。

其中，有來自印度次大陸的印度文明，有來自中國陸地和南海的中華文明，再往西還有來自印度洋彼岸的地中海文明。後來，地中海文明與一神教信仰相掛鉤，進而導致深刻的分化，分裂為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以阿拉伯語為基礎的伊斯蘭商人很早就來到了東南亞地區，而歐洲的十字軍和貿易公司則在十六世紀之後才抵達。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時代將世界引向了現代文明的理念，新加坡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帝國主義的爭奪中，這個被英國稱為「東南亞」的地區界域逐漸明朗，一個新的新加坡從中脫穎而出。在此地區，新的國家不斷建立，本地文化也被塑造為民族文化。

在過去的七十年中，人們一直在努力追溯這個無名地區的源頭。溯源之旅是一場引人入勝的探險，如今我們對本地區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我們仍在追尋歷史印象與當今現實之間的聯繫。在經歷了一段充滿探索的時期後，我想談談為何過去的歷史會對未來有所裨益。

新加坡不僅位於東南亞，更是這一地區的中心，在接下來的講座中，我將主要講述塑造了東南亞歷史的各種文明，並重點關注區域內發展的眾多文化，及其向周邊文明開放互動的歷史。

這也包括那些保持自身獨立的文化，他們學會了選擇自己文化所需的思想和制度，用以塑造其獨特的身份認同。新加坡也不例外。相比其他國家，新加坡起步較晚，加之新加坡堅定地走在現代化的前列，因此其民族身份認同並不十分明確。

有趣的是，所有新興國家都利用自己的歷史經驗以建立新的民族文化，同時希望與現代文明和現代化文明共存。在此背景下，本地區的民族國家一直致力於文化適應，同時應對國家建設、地區和諧以及超級大國之間的競爭問題。

為了了解他們如何處理本國問題並適應瞬息萬變的世界，我們需要研究在本地發展的文化，並縱觀在整個地區歷史中與之互動的各種文明。為此，我認為有必要明確區分「文化」和「文明」這兩個概念。

但需首先說明，以下講座的主題並非關於新加坡史或東南亞史，而是我們地區²的文化如何與那些塑造、豐富了本地特性的眾文明共存。此外，我們還將探討不同文明如何在本地區超越國界、交往互動。我將運用歷史學的框架來突出這一變化過程，並比較不同階段的互動所產生的不同結果。

文明惠眾

何謂文明？如何與文化相區分？這兩個詞都是來自西歐的現代術語。這兩個概念已被翻譯成各種地方語言，如今廣為使用。但人們並不總能區分這兩個詞語，並常在翻譯中交替使用。這兩個詞語很難找到滿意的定義，所以請容我稍加說明。

文化由一個群體共同擁有，這是他們共同發展出來的，也是他們認定屬於自己的東西。這類群體可大可小，從簡單的獨立部落到足以建立強大國家的複雜社群。文化可以是農業文化或畜牧文化，定居文化或遊牧文化，讀寫文化或非讀寫文化。他們可能由酋長、祭司、親王、國王甚至皇帝或選舉產生的領導人統治。由於各階層人民長期共同生活，無論是族群 (ethnic) 文化還是民族 (national) 文化，都可能既堅韌又獨特。

另一方面，文明則源於有識之士、先知、師者的努力，他們致力於詮釋宇宙奧秘，探尋地球生命的意義。人們從一套基本原則出發，構建出思想和道德體系，將所有人的生活昇華至超越地域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境界。

一旦強國或帝國的領導人受到這類卓識遠見的啟發，他們就會超越地域文化，用人性大同的理念定義轄下的無國界文明。此後，各國便會努力將本土的國家與文化納入這一文明的羽翼之下，並充當媒介將文明帶往其他國家。

現代的政治論述告訴我們，許多歐洲的早期政體發展出關於國家性質的新觀點，並因此確定了可自行決定國界的主權國家。其中，最強大的國家發展成為民族帝國，在強大的基督教傳教使命的支持下，立志以文明教化未開化的民族。許多歐洲地方文化逐漸發展成為民族文化，並化身帝國文明的代表，其影響遍及全球。到十九世紀，這種現代文明開始影響其所遇到的一切亞洲文化，其中包括日漸式微乃至衰落

在進一步統治世界之後，現代文明擴張的正當性在二十世紀因兩次世界大戰而受到削弱。兩次大戰都是發生在敵對的民族政權之間的內戰，它們擁有相同的文明，卻決意摧毀對方。然而，現代化的決心並未受到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旨在終結民族帝國，代之以平等的民族國家體系。

其理想是建立一套普世接受的價值觀。但是，對於何為普世價值，各國卻未能達成一致，進而導致了意識形態的分裂，引發了美蘇之間的冷戰。冷戰結束後，美國取得勝利，成為世界超級大國，預備向全人類傳播其現代文明。它有兩種選擇，一是幫助餘下的古老文明實現現代化並繼續存續，二是將其整合融入唯一現行的現代文明。

十九世紀，現代文明統治了我們地區的各個角落。在此之前，我們一直深受三大古代文明的影響，直到十六世紀，第四種文明到來，迅速連通了世界的各大海域。在本系列講座中，我將重點介紹東南亞、東南亞文化及其與四大文明的關係。首先，我將探討本地發揚的文化，及其與影響我們地區的古代文明之間的關係，尤其是滲透本地區長達一千多年的印度文明。

在第二講中，我們將放眼亞、非、歐三大洲古代文明交匯的地中海地區。我將追溯希臘—羅馬文明如何轉變為帝國—神教(imperial monotheism)的兩大構成部分。這將引領我們了解基督徒和穆斯林這兩個分叉的文明如何在本地區相互作用。

我的第三講將關注促使新加坡成為大英帝國重要港口的革命性變化，當時，大英帝國不斷擴張，作為最大的民族帝國，將現代文明散播至全世界。此外，我還將論及那些逐漸失去領土控制權的古代文明。隨著中國商人與苦力在新加坡日益重要，我也將探討與歐洲擴張同時發展的滿清帝國。此時中華文明看似達到頂峰，但卻頹勢已顯，難以為繼。

在最後一講中，我將探討二戰結束後東南亞地區如何與各種文明共存。當時，現代文明已然佔據主導地位，三個古老文明正努力實現現代化。在這三大文明中，中國經歷兩次現代化革命，實現了復興。如今，這一成功使其成為美國利益的威脅。在我們地區，新加坡自獨立成為城市國家後，不得不與多種文明共存。它選擇了一條特殊的道路，致力於「多元社會」的國家身份。在這樣一個古老文明力求現代化的世界中，新加坡對現代文明的接受，不僅是極具挑戰性的經歷，其未來的發展更值得特別關注。

文化意識

我在新加坡已經生活了二十七年，我日益關注其特殊的治理方式與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最重要的是，我對新加坡人民與眾多不同世界的關聯深感著迷。但這並不意味我有資格談論新加坡的管治。我很高興納丹訪問學者計劃委員會允許我跳出既定的主題。

新加坡如何與本地區的不同文化和文明共存，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加坡的經歷與其鄰國有相似之處，但差異

同樣顯著。許多評論家都對這一現象進行了研究，我從他們的著作中獲益匪淺。這是一個漫長的學習過程。

讓我先談談我的個人背景。我從小以華人身份長大，但在中國無家可歸，於是嘗試成為馬來亞人，之後改為馬來西亞人。然後，我來到坎培拉，成了一個澳洲人。坎培拉雖是首都，歷史卻比新加坡更短，在那裡，我遇到的所有人幾乎都來自外地，只有極少數人土生土長。之後，由於工作原因，我來到香港，又再次回到新加坡工作。凡我所到之處，或多或少都存在多元文化。因此，我的視野自然充滿了對文化的關注。

我發現，本地區的民族在與四種文明交流的同時，各自發展出獨特的文化，實在難能可貴。即使在強大的現代文明碾壓其他古代文明時，這種歷史應對的態度也一直延續至今。各民族認識到，建設新的民族文化正是他們的傳統。他們以發展和變革為途徑，實現文化的現代化。雖然新加坡可能自闢蹊徑，創造自己的民族文化，但我相信新加坡也會看到本地區的經驗並可資借鑑。

我第一次認識新加坡是在學生時代，當時我正就讀於新成立的馬來亞大學 (University of Malaya)，也就是現在的新加坡國立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57至1959年間，我回到該校擔任講師，後來調到吉隆坡分校工作。當時我們都以為新加坡將成為馬來亞聯邦 (Federation of Malaya) 的一部分。當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時，我不得以外界的視角觀察這個國家的發展。三十七年後，我又回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一間研究所工作。因此，我的新加坡經歷至少有三

重。第一層是在高等學府，第二層是在遠觀中的社會建設實驗，第三層則是在參與現代文明的國家。

在我首次旅新期間，有兩個畫面始終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中。第一幅是新加坡島與馬來半島頂端相接的畫面。我在大學圖書館找到了一些老地圖，這種關係在一個地名中可見一斑——*Ujong Tanah*，即陸地盡頭。數十年來，這幅畫面始終縈繞我心頭：一片狹長的陸地伸向大海，直入巨大群島的中心。正是這幅圖景，讓我時不時對半島及其歷史作用深感好奇。

另一個畫面來自我在新加坡街頭的漫遊經歷。我遇到了許多遍遊東南亞後來到新加坡的人，他們向我介紹了一種米南佳保 (Minangkabau) 的習俗，令我浮想聯翩。這種習俗稱為 *merantau*，一種漂泊、漫遊。出乎我意料的是，這種漫遊文化並非前往已知的目的地。他們不是多年漂泊在外，尋求體驗與機會，然後期待回歸故土；恰恰相反，許多人立志前往另一片土地，在那裡開始新的生活。我發現，*merantau* 一詞含義豐富，與這座港口城市的人口密切相關。

帶著這兩幅重新浮現的畫面，我以嶄新的眼光觀察了新加坡與眾多世界之間許多意想不到的聯繫。這些關聯有助於我了解該地區的多元社會，重新審視已然慣於彼此共處的眾多民族。「陸地盡頭」的概念也讓我思考文化和文明的起源。等我們探討全球化世界中現代文明所面臨的民族問題時，我也會再次回到「漂泊」的觀念上來。

作為一名歷史學生，我一直覺得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的概念引人深思。我記得自己曾嘗試理解現代文明從歐洲向